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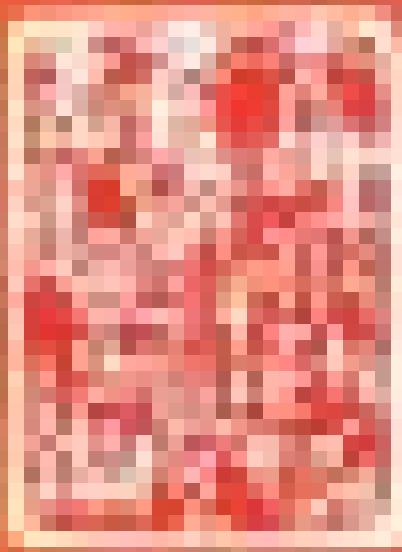
25.14

20



第五輯

大連市考古研究所



大理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黎明前的战斗	杨永新	(1)
黄洛峰同志革命斗争生活片断	舒家骅	(93)
忆革命的出版事业开拓者——黄洛峰	舒自志	(53)
辛亥革命先辈杨友棠先生事略	杨继雄	(58)
回忆先父马骥二三事	马德芝	(62)
马幼伯给岳丈漾濞田自方(坤)的信	田淳供稿	(66)
先父李全本先生事迹	李克艰	(6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两国合作在缅甸		
敌后进行军事情报工作的回忆	李品伟	(81)
回顾我到滇西抗日的历程	冯国真	(142)
回忆1942年国民党远征军(前期)赴		
缅作战片断	刘家茂	(193)
王炳章传略	张了	(205)
回忆曹默庵同志	洪光启	(212)
怀念张德兴医师	梁炳学	(215)
白族曲艺家杨汉	乐夫	(219)
滇戏传入鹤庆初查	潘金华	(222)
鹤庆洋琴说书	熊元正	(231)
蒙化地区“哥老会”概况	张文献	(240)
张结巴之死实录	杨泽仁	(261)
洱海东岸访今古	杨延福	(264)
漾濞文史点滴	张文锦	(278)

黎明前的战斗（摘要）

一回忆大理地下党活动概况

杨永新

一、赴剑受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配合下，以非凡的气概，赢得了震撼古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厉兵秣马，准备飞越长江天堑，完成历史的伟大任务。我长江以南未解放的各省，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各条战线上的斗争，特别是发展武装配合解放军，进行最后的决斗。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迎来了一个一九四九年的春节。

这年春节，是我离开大理十六年之后，全家在大理城

欢度春节的第一次。可是，我却思绪万千，日夜不宁。使我极为不安的是：在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正在艰苦卓绝地战斗着，而我却象久在战场驰骋的战马被关在马厩里一样，等待着中共云南省工委郑伯克同志的战斗指令。

就在这样煎熬的时刻，由剑川寄来了张旭同志的信，他叫我迅速到剑川会晤。我理解这封信的意思：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剑川，我的工作由剑川滇西地工委分配。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欢喜，春节还没有过完，就启程上剑川报到。

剑川我没有去过。我想，周城做布匹生意的人一定熟悉剑川和洱源的人，可以搭伴跟他们去。于是我先到了周城张垂绅家。张垂绅在大理教育局当督学，是我在大理县中的同学。他只知道我到剑川访友，并不知道我去干嘛，他把我托付给他的兄弟。

张垂绅的弟弟借右所街天的机会，把我带到右所。在街上又把我托付给一个三营姓杨的熟人。我在三营杨家住了一晚，受到热情的接待。第二天他把我带到牛街，给我指了到剑川的路，然后竟自到鹤庆赶街去了。

我跟在一群客商后面，来到了剑川城，找到了剑川县中。张旭同志见我到来，十分欣喜，泡茶端水，让我漱洗，然后吃饭。当晚，我就和张旭住在教员宿舍。

第二天，吃过早饭，张旭同志领我到欧根家，欧根夫妇是我多年的故交，他们见我到来，热情欢迎。欧根带我到宿舍里，轻声地对我说：“我们这里，准备进行暴动，搞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大军，解放西南，解放祖国的边疆。滇西地工委向滇工委要军事人材，滇工委把你的关系给了我们，我叫张旭同志写信通知你，请你上来。”稍停，他继续说：“我们永胜地下党，拥有五百来人的武装，准备暴动，你能

不能去率领这支队伍，去搞武装斗争？”我考虑了一下，然后很爽快地对他说：“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一定做好这支武装的工作。”我问：“什么时候去？”他说：“你暂时在张旭同志家里住下等着，我先派人去永胜联系。”

谈完话，转出卧室，张旭同志已在外面等我，他要我同他到剑川中学，参加李岳嵩同志出狱归来的欢迎大会。我和张旭到了县中。一位银须飘洒，身着长袍的白发老人，主持了这次欢迎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正义凛然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专横霸道，屠杀进步青年，镇压人民的滔天罪行。他说：李岳嵩校长出狱归来，是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坚持斗争，为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张旭告诉我，此人叫赵鑫象，是现任的教育局长。他早年到过广州，亲眼看过孙中山和北伐出师，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他是王以中同志的老岳父，经常和地下党的同志接触，直接间接接受了党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当这个教育局长，为我们安排了许多人在教育部门工作。在他的掩护下，我们办了许多农村夜校，名为扫盲识字，实际上是我们党进行组织活动。他讲完了话，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他的邀请下，一个身着西装、脸膛红黑、约莫在四十岁左右名叫李岳嵩的人，登上了讲台，他一开腔，就感谢剑川父老和剑川中学师生对他的声援和热情欢迎。李岳嵩叙述了国民党政府如何逮捕他、押解他到昆明。首先是军事法庭审讯，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是共产党，以剑川中学校长的职务，对学生进行赤化教育。他一一予以驳斥。在法庭上，反动派捞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时，教育界发出了声援，社会各界对于反动派这种作为，发出了抨击。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反动派只好把他从军事法庭转到了地方法院。最后，因为证据不

足才不得不无罪释放。他说，他能走出反动派的牢笼，完全是人民斗争的胜利。从今以后，他要更加愤发，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育好人才。他讲完了话，大家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随后还有几个人登台讲话，异口同音，都在声讨反动政府反对民主、扼杀青年、压迫人民的罪行。欢迎会变成了声讨大会。僻处边陲山间的剑川小县，洋溢着浓烈的进步民主空气。

下午，应邀到欧根家做客，席间见了王以中、陈端芬和陈淑贞等同志。饭后，我跟张旭回到了他在西庄的老家并住了下来。

一天，张旭从城里回来，带来了欧根的口信，叫我到城里会他。我满以为永胜之行就要实现，一夜辗转反侧，思想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浮沉。第二天，吃过了早饭，我就辞别张旭一家老小，进城到了欧根家。欧根把我带进他的寝室，细声地对我说：“我们派到永胜的联络员已经回来了。我们的武装，不等地委的指示，就仓猝纠合起来暴动，事机不秘，缺乏警惕，被永胜罗瑛的共革盟武装包围歼灭。只有杨新纪等数人突围出来，现在焦石洞待命。我们派去的两个联络员，一个被杀，一个冲出重围，回来报告。现在永胜暴动，已经失败，你还是回大理去，到剑川中学找陈茂群，组织上会安排你的工作”。永胜地下党武装起义，遭受罗瑛的屠杀失败，在我火热的心头上，浇上了一瓢冷水。第二天清晨，我就离开剑川，返回大理。

二、南湖会议

到了邓川中学，找到陈茂群（即陈柏松），相见之后，彼此谈论契合，使人感到非常亲切。他要我放手发展党的组

织，肃清关门主义的影响，特别要先发展“民青”（党的外围组织），农村里放手发展农抗（全称是农民抗税抗粮抗兵会）。他留我在校吃住，第二天，我就返回大理。

大理是滇西的重镇，是滇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动势力在这里不仅驻守着重兵，确保大理的安全，它还把附近各县组织起来联防，一有风吹草动，就一齐出动，互相支援，共同作战，平时宪兵、警察、特务，四出侦察搜查，并有青红帮等帮会作他们的耳目和帮凶。中共大理地下党直插敌人的心脏，发展组织，进行推翻反动王朝的斗争，无异于在刀山火海里进行战斗。进行每一种活动，都要十分谨慎小心，注意伪装掩护，还要特别注意斗争的策略艺术，因此，无论开会、行动，都要作精心的设计，巧妙的安排。

我从邓川回来，没有在城里多住，很快回乡下老家探亲访友，调查了解我的家乡情况。

一天，我三嫂告诉我，有一个下鸡邑的教书先生名叫李谦的来找我，叫我到什么海舌地方去会他，他在那里等我。我知道组织上已经派人来跟我联系，立刻起身回城。次日清晨我就到了下鸡邑村去。李谦和我，素不相识，我们相见，互通姓名，对上了联络暗号，他随即把我带到南湖塘边小石拱桥上。桥下停着一只小船。只见一位身装长衫，戴着眼镜的人，向我们走来。我认出他是大理专署教育科长王晓云。王是邓川人，我曾在赵秋江家里见过。这时，从南边龙凤村又来了一个着长衫的年轻人，他和李谦、王晓云见面，互问寒暄。李谦叫我们下去坐船。等我们坐好，李谦用竹篙把船撑进湖心停稳。王晓云首先说话：“今天我们是借赏景游湖，召开这个会的。”他把我和杨崇道分别作了介绍，然后

继续说：“滇西地工委指示我们，成立中共大理县委员会，李谦、杨崇道、王晓云和杨永新为县委员，王晓云为书记，杨永新为副书记。”他又传达了几点地工委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杨崇道和李谦作了简短的发言。我初次参加会议，还不了解情况，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共大理地下县委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就是这样召开的，它揭开了大理历史新的篇章。

南湖会议开过没有几天，陈柏松、段亚华夫妇为着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辞去了邓川中学教员的社会掩护职务，来到大理，住在我家，从事于职业革命活动。他精心安排了一次党的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建水卸任专员，刚出任大理县长不久的朱仲翔的公馆里。朱仲翔膝下没有儿女，由侄子朱炳淳过继立嗣。朱炳淳大学毕业，在大理省中教书，他是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成员。陈柏松通过这个关系，安排了这次会议。当我们先后到达朱公馆时，朱炳淳把我们迎候在满堂书画的客厅里，传烟送茶。等到人齐，他把我们引进他楼上的书房，放下烟茶和几把暖水瓶，然后走下楼去。

会议开始，陈柏松同志传达了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解放军将要渡江作战，粉碎国民党的江防，彻底推翻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柏松从口袋里拿出了两份章程在会上念，一个是“农抗会”章程，一个是“民青”章程。经过讨论，决定在学校师生和农村贫苦知识分子中，放手发展“民青”。在农村贫雇农中发展农抗。县委并作了分工。

我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从蒙自送家眷回来后，就在大理

城玉洱路租了周家的两间房子住。院内右边厢房住着一个剑川人，名叫杨郁文，县公路工程处的，对我很好，但我不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北方堂屋和西面厢房，是房主人住，她是一贯道的坛主，经常有信徒来往。东厢房一间，租给四川人陈明洁住，他是师管区的军官，他的家里，经常有军官出入。我们这个院子，居民不多，身份并不简单，它是当时社会的局部缩影。我们这些人，虽然各人的政治经济极不相同，但相处相见，总还要互相招呼，互道寒暄。甚至有时彼此还要拉上一阵家常。陈柏松、段亚华是教师，不搞世俗应酬的那一套，不愿和这些人交往，因而生活上出现了极不和谐的格调。陈柏松、段亚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想及早离开我家，另求栖身之地，但一时还找不到适当地点。恰在这时。杨化在街上遇到了阎士颐同志。杨化和阎士颐是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为了革命，他们被党派到各地工作，杨化从昆阳回来在中正中学教书，他的组织关系已与陈柏松联上。阎士颐到滇东南工作，因病回家，等待组织上的联系和分派工作。杨化给他联上了“民青”的组织关系，交给了陈柏松。陈柏松跟他谈到了居住问题，阎士颐欢迎陈柏松夫妇到他家去住，经过陈柏松的慎重考虑，认为在阎家居住，比较安全，工作往来较为方便，当即搬家过去。

阎士颐的父亲，名叫阎旭，号达夫，毕业于云南讲武学校，文才武略都很好。他在张汝翼部下当营长时，张汝翼和龙云争夺云南省主席的大权，大打出手，互相厮拚。张汝翼棋高，占领了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机关，抓住了龙云，交给阎旭营长看管。阎旭看管龙云，不把龙云当囚犯看待，口口声声“军长”长、“军长”短，饮食起居，都作了优厚的安排。龙云的妻子李培莲每次去看龙云，阎旭都盛情接待。有

一次，李培莲将手镯脱下来给阎旭，阎旭辞不接受，并对李培莲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后来龙、张两家，胜败易手。龙云出了牢笼，碧鸡关一战，张汝翼败北西逃，龙云追奔逐北，卢汉手下的连长张吉祥，在石鼓擒住了张汝翼。龙云将张汝翼枪毙在下关。龙云为感报阎旭对他的深情厚谊，屡予提拔迁升，把他提为团长、旅长。卢汉为了使阎旭搞点钱，安度晚年，任命阎旭去当澜沧县长。澜沧远在边疆，盛产鸦片烟土，在那里当县长，无异于叫你到那里发财。

陈柏松夫妇到了阎家以后，地下党的活动、接头，主要在那里进行，县委的重要会议都在那里开。当时，阎士颐还不是党员，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他除了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外，他最大的责任就是负责我们的安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剑川地下党发动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滇西地工委决定将陈柏松、段亚华调回剑川工作，他们夫妇奉命离去。这时，滇西地区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鱼龙混杂，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余建勋出师西上后，讨平保山共革盟民变武装，进驻大理，镇守滇西。特务到处横行，帮会兴风作浪，民不堪其荼毒。大理县中教员杨兆祥、张心如的寝室被大理师管区政治部派人突击搜查；县常备队到湾桥突击清乡；桂楼乡乡长杨茂实为头组织保和社帮会，到处抓丁派款，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县委的领导任务更加加重，县委会议更加频繁。但从陈柏松走后，阎家府上，我们没有借口再去，一时找不到妥当的地方，县委的同志都为着这个问题在发愁。后来，在我爱人的启发下我在家里摆起麻将桌，以打麻将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从此，县委会议经常在我家麻将桌子上开，重要的决定，也是在麻将桌子上作的。

三、邓川遇险

剑川武装起义，打响了滇西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乔后的武装起义接踵而来，他们里应外合，迅速解决了乔后井盐场的警卫武装，夺取了乔后和盐场的领导权，宣布了乔后的解放。税警队的残余武装突出乔后，向洱源大理逃窜。

滇西地工委书记黄平，此时坐镇洱源。国民党洱源县长甘舜是地下党员，他的秘书万国祥也是地下党员，县常备队也成为党的武装。洱源县政府表面上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乔后税警队残部突出重围以后，乔后地下党迅速派人通知洱源。黄平和甘舜进行了计议，当机立断，决定派遣常备队一个排的武装，化装成老百姓，由肖鉴明率领到罗平山险要地方，进行伏击，将其彻底消灭。但因为部队耽延了时间，税警队如脱弓之鸟，行动非常迅速，在县常备队尚未进入伏击地点前，就迅速通过，并安然进入洱源县城。黄平和甘舜只好再作计划，派肖鉴明同志率领常备队武装，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借查店为名，伺机将税警队残余武装加以消灭。于是肖鉴明又穿上国民党常备军官的官服，率领武装到了税警队的住店，只见税警队人人持枪，弹上膛、刀上枪，已作好战斗准备。肖鉴明无机可趁，只好随便问了一下，即回来汇报。洱源县常备队这支队伍，是由旧任县长移交给甘舜的，政治素质很差。当时洱源地下党还没有多大发展，因而没有丰富的血源可以提供给甘舜，为这支部队换血更新。肖鉴明派去当分队长时间很短，在部队里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心血不和，脑体不灵，这就是放走税警队，攻打不下凤羽恶霸马老六的根本所在。

邓川县长挂冠而去，国民党邓川县政权，暂时出现了真

空。地方权绅，尔虞我诈，乘机专权。但县常备队已经解体，县政权赖以发号施令的权威不复存在，县政也是空有其名。恰在此时，乔后盐井税警队的残余武装，闯过洱源，来到邓川，驻进了原来邓川县政府衙门。

地下交通带来滇西地工委的秘密指示，要我赶到洱源，汇报大理组织的发展活动情况，我把自己打扮成买卖土杂的商人，身上携带着购买土产的货单，从容上路。

到了洱源，找到黄平，当我拿出货单，准备向他汇报时，他拿过货单问我，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啥？问得我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我这货单上的乳扇代表党员，弓鱼代表民青，草席代表农抗，货单上的数字，就是他们的数字。我汇报完工作后，黄平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对大理的工作提了几点意见。当我们谈话完毕时，落日已经衔山。我从大理来到这里，滴水未进，正想找饭吃，不料陈柏松从背后出来，叫我立刻动身，跟他返回邓川。我只好把裤带勒紧一些，跟他上路。天黑后不久，我们到了中所上村民青成员王家良的家。王家良接待了我们。饭后，陈柏松召来了艾泽、段伯苍等五六个人开会，布置到西山接应攻打马老六队伍的任务。陈柏松用火线入党的办法，办理了五六个人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

一天奔走，跑了百多里路，会开到深夜才散。一觉醒来，已经是春光满楼，日上三竿了。早饭以后，叫来了负责邓川城和南区工作的邓川中学教师陈自洪、孙致岐等同志来开会。听了他们的汇报，讨论了有关武装起义的准备事项。大家一致认为，邓川现在是处在真空状态，只要我们掌握一定武装，发动起义，不会遇到有组织的武装抵抗。税警队虽然在城里，但它只是过路的客人，不会为别人拼命抵抗。只

要我们布置相当力量，加以防卫就行了。机不可失，会议决定加紧准备，在最短时间内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由杨永新负责指挥。分头安排就绪，约定后天晚上在王家良家开会，检查准备工作。

诸事完毕，我就动身奔向右所，坐上一架到大理的马车。回到大理，我找来了王云、杨崇道等同志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南分局的指示和黄平同志对大理地下党的工作意见，并说我要到邓川，负责武装起义，我在大理的工作，暂时交给别的同志代理。

次日清晨，我起得很早，催促家里做饭吃，家里问我干什么，我以下乡有事推托。早饭后，我带上望远镜，就急速出门，奔向邓川。到了沙坪，找到王允臣，了解邓川昨今两日的敌情变化。王允臣说，昨夜路其五的匪部抢了右所，烧了几间房子；税警队仍在城里；地方权绅旧军官张洪和张桐岗二人，今天到焦石洞和路其五勾结，组织自己的武装，企图夺取邓川政权。邓川全县人民惴惴不安，安全没有保障。我了解了情况后，不敢稍有耽延，迅即起身，向中所王家良家而去。进邓川南门，没有岗哨盘查，街上没有人来往，非常寂静。县政府门前，有两个枪兵站岗，税警队驻在里面。邓川城很小，吸一支香烟可以来回走三趟。心上急，脚步快，一下子就到了北门。北门站了两道岗，有一个挂着一只手枪，也在门边站着。我一出门，岗哨用枪拦住了我，这个人就上前盘问我：“你干什么？”“做生意。”“你到那里去？”“到右所买货收债。”这个人就叫“搜”，把我头上的毡帽取下来检查，摸遍了我的全身，什么也没有，他们很失望，打算收场放我走。一个枪兵，撩起我的衫子一看，看见了我裤裆上挂着的望远镜。他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七嘴八

舌地大骂我行为不轨，拿起一根麻绳把我綁起来。那个背手枪的拉着绳子，把我押上北门城楼，向一个姓王的副官（听说此人叫王亮臣，是王允臣的堂弟）报告，副官把我的全身上下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开口问我：“你从哪里来？”“从大理来。”“要到哪里去？”“到旧州”。“到旧州干啥？”“找我亲家。”“你亲家是谁？”“张桐岗。”他听到张桐岗三字以后，面部表情发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他接着问我：“你带着望远镜干啥？”“今年年初，我亲家张桐岗到大理找到我，叫我在三月街上替他买架望远镜。我替他买下，今天特意从大理来送给他的。”他啊呀呀大叫起来，说：“张桐岗是我们的营长，我就是他的副官。对营长的亲戚，做出这样的事，发生这样的误会，真是对不起你。”他急忙解开我身上的绳子，见我的胳膊被绳子勒进很深的一道，他一边骂捆我的人良心太狠，一面解释，请我不要跟他们计较。副官给我泡上一碗香茶，又把烟筒递给我吸。他说：“房里是营长的烟铺，是不是进去吹几口过过瘾？”我说：“我没有烟瘾。”我一边吸着烟筒，一边在思考脱身之计。不错，皖南事变以后，党叫我们要广交朋友，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个时候，我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亲家，张桐岗是其中之一。张桐岗原来在一八四师当中尉排长，参加了台儿庄、保卫大武汉和保卫长沙的几次战役，是个思想进步、爱国、积极抗战，勇敢作战的青年军官。他把他前妻生的儿子拜寄给我作干儿子，我给他取名叫张本。所以说张桐岗和我是干亲家，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但张桐岗从一九四一年春离开部队以后，在邓川办理邓川国民党的什么军粮供应站，他搞了不少的钱，成为邓川有名的权绅之一。他今天和张洪到焦石洞与路其五勾结，正是

要把土匪武装拉作自己的资本，然后夺取邓川县的政治统治权。事实证明，他走的完全是和我相反的道路，是和我水火不能相容的。我刚才对这个副官讲的话，都是我瞎编出来的。我回到大理，张桐岗并没有来看过我，如果我再呆下去，万一张桐岗回来，就要露出马脚。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立刻放下烟筒，抱着肚子哼了起来，王副官问我哪里疼？我抱紧肚子说肚子疼，向他要了一张手纸，说要去解大便。他拿了一张土纸给我。我又故意装糊涂说：“我是初次到邓川，地方不熟，厕所在那里也不知道。”他把我带到城楼边上，指点着靠东面的地方，叫我顺着他的手指的地方去，就是厕所。他关照我解了大便，赶快上来，吹上几口烟就没事了，营长他们也快要回来了。我不住地用“谢”声来回答他。临走，我看了放在桌上的望远镜一眼，它跟随我转战多年，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入越受降，而今天，我只有眼睁睁地把它放弃。我走下城楼，进了厕所，还看见王副官在城楼转来转去望我，我进厕所假装脱裤蹲下，朝城楼上一望，王副官已经回屋去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爬上厕所的矮墙，然后又登上东城的土墙，一个纵步就跳出东城外面。这时，什么人也没有。我立刻就往回跑，跑到沙坪王允臣家。我把遇险的情况告诉他，并要他连夜送我走。王允臣带上两颗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首先把我送到了马甲邑周凤岐家。

第二天清晨起来，吃过早饭，王允臣告辞回去，周凤岐领我由小路翻过德源山城旧址，走上了通右所的马车大路。就在这里我们碰到了陈柏松，他告诉我邓川武装起义的条件尚未具备，决定暂时放弃，中所不用再去。我即转回大理。